

用典释义

病有标本。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是谓妄行。

【讲话原文】

古人说：“病有标本”，“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是谓妄行”。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找准导致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脱贫攻坚举措。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县、贫困村，致贫原因和贫困现象有许多共同点。

——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出处】

黄帝问曰：病有标本，刺有逆从，奈何？

岐伯对曰：凡刺之方，必别阴阳，前后相应，逆从得施，标本相移。故曰：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本，故治有取标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故知逆与从，正行无间；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

——《春秋至两汉》《黄帝内经·素问·标本病传论》【解读】

《标本病传论》是《黄帝内经·素问》的第六十五篇。“标本”，这里主要指发病的先后主次；“病传”，指疾病传变的规律。

在本篇的前两节，黄帝与岐伯讨论了疾病的标本和刺法（又称针法）的逆从。黄帝问道：疾病有标和本的分别，刺法有逆和从的不同，是怎么回事？岐伯回答说：大凡针刺的准则，必须辨别其阴阳属性，

联系其前后关系，恰当地运用逆治和从治，灵活地处理治疗中的标本先后关系。所以说有的病在标就治标，有的病在本就治本，有的病在本却治标，有的病在标却治本。在治疗上，有治标而缓解的，有治本而见效的，有逆治而痊愈的，有从治而见效的。所以懂得了逆治和从治的原则，便能够进行正确的治疗而必有所疑虑；懂得了疾病的标本关系，诊治疾病就可以万无一失；不懂得疾病的标本关系，那就是胡乱诊治了。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标”和“本”，是对疾病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先后、轻重、缓急等本质联系的医学哲学的抽象。一般说来，“本”是指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对疾病性质的概括；“标”是指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是对疾病现象的反映。所谓“治病必求于本”，就是要透过疾病的现象——症状证候，去探求疾病的根本——病因病机，从而进行针对性治疗，达到治愈目的。

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借中医治病谈脱贫攻坚。治疗疾病必须分清病因，分辨标本，只有针对病因采取相应措施，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同理，“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找准导致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脱贫攻坚举措。”

（杨立新）

诗话衡阳

望衡山

■刘禹锡（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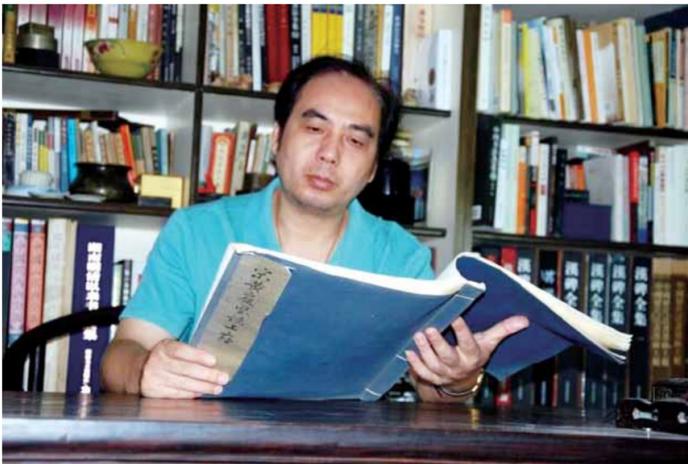
东南倚盖卑，维岳柱石。
前当祝融居，上拂朱鸟翔。
青冥结精气，磅礴宣地脉。
还闻臆寸阴，能致弥天泽。

诗歌赏析：这首诗是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再贬连州道中所作。通篇来看，诗除了描写衡山的景观、气势之外，也蕴含了作者的深情与期待。这首诗想象神奇，将神话与传说诸诗笔。首句“东南倚盖卑，维岳柱石”，借用《淮南子·天文训》的说法“天倾西北，将人视觉中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比喻成倾斜的伞盖——倚盖，而衡山就像支撑四维的大柱子屹立在南端；颌联“前当祝融居，上拂朱鸟翔”借用火神祝融的居所、南方神鸟——青鸟的羽毛写山势之高与衡山地位的尊贵。颈联“青冥结精气，磅礴宣地脉”，气势更大，茫茫青天凝结了精气，磅礴地宣告着地势与脉络；尾联“还闻臆寸阴，能致弥天泽”为隐喻并寄托；臆寸是古代的测量单位，一指厚度为寸，四指厚度为肤，肤寸喻小，此句中臆寸和弥天为对立意，表面写衡山雨，实喻自己为国家栋梁之才，有着为国效力的期待。诗人在此表达了自身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苦闷，这份愁闷在如此气势浩大的衡山面前得以抒发。

国学荐书

《历史大咖的另一张脸》

该书以随笔的方式，写出了历史名人的真实一面，通俗易懂、风趣幽默。书中既有对孔子、庄子、李白、杜甫、白居易、吴承恩等文豪的深刻解读，又有对白起、王翦、韩信、司马懿、岳飞、吴三桂等武将的另类描写。全书时间跨度达三千年，采用三重架构，对历史人物进行了生活化、文学化、思想化的描写，剖析历史、品味时代，以世俗的眼光看待圣人的跌宕人生。人民出版社编辑安新认为：这是一部八分尊重历史、两分情景模拟，衔接古代与当代的“实用”学术著作。



林乐伦

十分欣赏曾熙的书画，邀请他去上海展示字画，名噪一时，成为海派画家领袖，张大千也曾拜他为师。曾熙在上海时，家里经常高朋满座，来的大多数都是在书画界的湖南老乡，如何维朴、谭延闿和谭泽闿兄弟、杨度、曹典初、曹广帆、符铁年、夏寿田等。他们以书画为友，经常切磋绘画书法的技巧与心得，共同提高。

曾熙的书法以秦汉篆隶笔法为主，得力于《夏承碑》《华山碑》及《张黑女》等碑刻神韵。本来写在石碑上的字体就要方正庄重，加上用刀铗刻碑，笔法的人口转折则更显力度，加上石面受风雨侵蚀而出现斑驳及破损，因而在墨拓上出现自然的斑点，使字体更显得刚劲古拙，这也是行家们常说的金石味。曾熙则巧妙运用这个特征，加上自己的学识与经验，他的书体别具一格：他用魏碑笔法写行草，方圆兼备寓刚于柔，游锋流转婉婉多姿，笔法古朴苍劲，竖笔挺拔气足稳健能扛鼎，横笔刚劲能力扫千军，被当时书法界称之为“农髯体”。

其中，张大千由于晚年创泼彩泼墨山水，其在青绿山水方面的成就被写入了近现代美术史，而吴湖帆亦由于整体知名度等原因，其青绿山水成就亦被画坛重视。然而，同时代甚至比张大千、吴湖帆更早进行青绿山水画探索并取得重要成就的一些画家却被历史选择性地遗忘了，其中萧俊贤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萧俊贤，1865年生，字泉峯，号

铁夫，别署天和逸人，斋名净念楼，为湖南衡阳人。早年师从南岳僧释苍崖法师及沈咏芬，曾行艺于湖南、广东、南京、北京、上海等近代美术重地，与海派、岭南派、京派重要画家以及众多民国政界、文化、教育、艺术界名流多有交集。

1907年左右，萧氏辞官不就而任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图画教员，是近代高等学堂中最早的中国画教师，此后迭居南北多所重要美术学校的国画教授、系主任乃至代理国立北京艺专校长，并兼任中国国画学会评议，晚年鬻画课徒于沪上。其培养的学生、弟子众多，艺术影响深远。

萧俊贤的书法自颜真卿、柳公权而上溯“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下及苏东坡，最终去颜而去柳骨，形成了雄浑苍健、铁画银钩的自家面目。从其传世作品的总体情况来看，其山水画“以浅绛为多，水墨次之，亦工青绿，且作没骨。”

1944年，萧俊贤80岁，在上海举办首次个人画展，当时上海《新闻报》、《申报》、《新闻时报》连续数天刊登：“衡阳萧屋泉先生，绩学善画，叠居南北讲座，指导艺术，生徒甚众。书法朴茂古雅，题咏大多风趣，画兼南北二宗，气韵高远，笔墨苍劲浑厚，允一时之冠。”9月12日《民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昨日为开幕第一日，虽天阴细雨，而到会参观者，肩比踵接，不下二千余人。西藏路上车水马龙，盛极一时。”展览三日，200余幅作品当即被订购了80多幅，小画幅山水，价格100元以上，大幅作品500元左右。

这样的价格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要知道，1942年的物价，买一架小型飞机只要1万8千多元，折算成画，大幅的只要30多幅。在上海，达官贵族，文人墨客，其厅堂书斋以挂萧俊贤山水画为荣。《民报》称其为：独步南北之大家。

话：“忍就是‘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今天我们讲‘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体现的就是忠恕之道。为人处世，应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凡事先从自身找问题，不要苛责他人。”

“忍”的处世原则不是无原则和无非非观念地妥协退让，更不是姑息纵容，而是体现仁爱襟怀、宽宏气量、忠恕之道的处世智慧

“一朝之忿可以亡身及亲，锥刀之利可以破家荡业，故忿争不可以不戒。”正如古语所云“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忍”的处世原则不是无原则和无非非观念地妥协退让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忍”也是一种心性涵养的定力，是官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忍经》引《吕氏童蒙训》云：“当官以忍为先：忍之一字，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是先务。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办？”为官者经常会遇到一些棘手难缠之事，猝然而临之，更需要忍字当头。《吕氏童蒙训》亦云：“当官者先以暴怒为戒，事有不平，当详处之，必无不中”，即慎重周详地处理事情。特别是那些面对群众矛盾纠纷的干部，处事应该心平气和，虑事周详，力戒暴躁鲁莽。

“唯得推恕”。“忠恕”既是儒家“爱人若己，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的体现，也是儒家主要的处世原则。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人处世无非两件事，对己和待人，即对内和对外，“忠恕”是对外的原则，对自己不适宜。吴亮引范仲淹次子范纯仁的

（据《学习时报》）

衡阳是一座文化厚重的城市，自古以来，便文气郁郁，才俊辈出。论及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书画篆刻史，衡阳应为一重镇。其卓然于世者有：彭玉麟、释苍岩、符翕、符铸、曾熙、萧俊贤、冯白、萧迁、陈少梅等。近日，市文联主席林乐伦做客国学讲座，带大家一起走近——

活跃在民国书画界的“衡阳才俊”

■本报记者 许珂

典型的中国人画是将诗、书、画、印的涵养，人的道德精神、思想理念熔铸一体，以易、玄、老庄、孔孟、禅道之哲学美学作根基，透过中国画的载体，直指天地之心，直切真如之性，直达物我两忘之境。借形写神之功，激荡于笔端，磅礴于气象，宣泄于笔墨，张显于纸绢。故中国人画艺术魅力永恒，即使现代科学文明再发达，其灵雅神奇之创造生机，仍熠熠生辉。

“民国时期，衡阳书画界呈现出人数多、水平高、分布广的现象。如，‘西城三怪’中的冯白，‘萧派山水创始人’中的萧俊贤，‘民初四家’中的曾熙。”一开场，林乐伦就向观众阐述了当时衡阳书画的特点，“仅《民国衡阳书画》一书就入编了77位知名的衡阳籍书画家，他们均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浙江、广东、福建等地享有盛名。”

冯白：以诗、书、画、印四艺兼擅而名噪京华

冯白，字白广、白广、白庵、剩瑕，斋号半瓦斋，衡阳县九里渡（今九里乡）人。1918年4月15日，冯白被北平艺术学校（后改称国立北平艺专）聘于该校花鸟画讲席。当时，冯白以诗、书、画、印四艺兼擅名噪京华，与声震京城的湖南画家萧俊贤、齐白石三人并称“冯萧齐”，与齐白石、雪庵和尚共号“西城三怪”，与符铸瓢庵、姚尊壶庵合称“衡阳三庵”，又与当时衡阳书画名家符翕、曾熙、萧俊贤并称“衡阳四杰”。

冯白与齐白石相交甚密，艺术上也相互影响，这从他们的画和印中可以找到不少共同点。

齐白石刻印不拘绳墨，敢于独造，然在小于他的冯白面前却较为谦逊。齐白石曾刻一方“冯白之印”的白文印，款是这样写的：“吾友白广自言刻印天下无敌手，索余刻未必当意，齐璜”。从边款中调侃的文字中可见他们的关系，同时也可以一窥冯白的傲气。

不过，从《冯白篆刻下册》印谱中，冯白的自叙还是比较谦虚的“余学篆刻三十年，至今未得其道，所刻名印不过为一时之需，未足观也，寿轩乞印册，殆亦阿其所好者耳，癸亥六月白广记于京师”。但在下册的自订印石润格中，其本性便坦露无遗：“白广篆刻，石章每方三圆，劣石不刻，牙章玉质总徒然，石印长圆亦不镌，但取一方三四字，若加字数倍加钱。”从这幅润格中，可以看出冯白的“牛劲”，三四字方章两圆一方，在当时的价格不菲了，加字数倍加钱，若没有底气，没有市场，是不敢这么狂的。

冯白印章布局巧思，如“代照印”三字可看作四字，亦可看作左右两字，似分还合，意象团和。印“云岩伯子”吸收汉隶碑刻布局，作上下两段，布字简约，跌宕有致。“福广符铸之印”字方面积大一，在当时的价格不菲了，加字数倍加钱，若没有底气，没有市场，是不敢这么狂的。

冯白治印边款精绝，印从书出，书从印入，其书法、画跋、印款都能同出

一辙。早期的二方行书边款师皖派，以冲切和单双刀并用，行书的笔法起伏波动，映带回环，柔中有刚，转折有度，精确地表现了二王书风。晚年印大多署北魏楷书款，刀笔生拙，骨劲古茂，与悲庵反其道而行之。

除了刻印之外，冯白的诗书画皆为上乘，其诗于古风、律绝、赋、短句皆信手拈来，或叙心境，或言体悟，或以梅菊托高洁，或以隐物讽时艰，斥之为文，形之于笔，耐人品嚼；其书艺于篆、隶、楷、行四体具能，以经学之士，研小学，攻大篆，学猎碣，习魏楷；其治印取法秦汉，旁及浙皖，气象苍古雄厚，布局巧思，气存神足，白文印尤见功力，边款更为精绝；其画工花鸟、兰竹、翎毛，粗枝大叶，随意挥洒，饶有生趣。

曾熙：民国书画界三个著名“大胡子”之一

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书画界，有三个著名的大胡子，其一于右任，其二张大千，另外一位就是衡阳人曾熙。

看曾熙的书画作品，可在题款中见到一个写得很怪异有点像篆体“夙”的金文体“髯”字，费了好大劲才知道是与他的大胡子有关联。原来，曾熙是个长满一脸大胡子的魁梧男子，他也就自号“髯公”及“农髯”。

曾熙除了胡子长得好，他的书画水平也极高。特别是其书法造诣很深，篆、隶、八分、真、行，各体皆精。晚期作品更是方圆兼备，寓刚于柔，用笔藏转，婉婉多姿，被学者尊为“农髯体”。晚年兼学绘画，倡书画同源之说，常取草篆行狎的笔意作画。与明末清初僧石涛、石溪、八大山人同一格调。晚年所作泼墨山水和墨梅，尤妙绝一时。

曾熙1861年出生在今衡阳的石市乡，字季子、嗣元，号侯园，晚号农髯。1890年中举人，随后入刘坤一幕赴山海关防御倭寇。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进士，升兵部主事，1905年返湘，主讲衡阳县石鼓书院，后任湖南咨议局议长、教育学会会长。辛亥革命后，闲居在衡阳老家，每天写诗、练字、画度日。

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先驱李瑞清就

国学教育

《忍经》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忍”？

“忍”的处世原则不是胆小怕事，不是明哲保身，也不是无原则和无非非观念地妥协退让，更不是姑息纵容，而是体现仁爱襟怀、宽宏气量、忠恕之道的处世智慧

“忍”是指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为了求得和谐、和睦而采取隐忍、谦逊、避让的态度。中国古代留下了许多“忍”的格言和故事。元代人吴亮，搜罗了自先秦至宋代173条有关“忍”的典型故事和言论，编成了《忍经》。为了避免人们对于“忍”的误解，吴亮在《忍经》的序言中对“忍”进行了严格界定。他认为“忍乃胸中博阔之器局，为仁者事，唯宽、恕二字能行之”。《忍经》中以“忍”为原则的处世之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忍”的意义在于：不为生活小事影响大局

“有容乃大”。“容”与“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本质上讲，“忍”首先是一种个人品德修养的克己功夫。吴亮所引的第一条言论是《周易》损卦之《象辞》，“君子以惩忿窒欲”，意即抑制愤怒、控制情欲。控制调节自己情绪，不为小事所困扰和影响，才能办成大事。忍住自我的不良情绪的同时，意味着必须包容、容纳别人的过错。我们常说的“有容乃大”，最早出自《尚书》，原文为：“成王告君臣曰：‘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济者，成功也。“忍”是成就伟大事业的

必要条件，“容”是道德高尚的必然要求。吴亮引《论语》中的两条言论来说明“忍”的危害。一条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一条是孔子告诫子路之言，“柔必胜刚，弱必胜强，好斗必伤，好勇必亡。百行之本，忍之为上”。此外，《忍经》还讲述了韩信“忍”的故事，来说明“忍”对于成就一番事业的重要性。韩信忍受胯下之辱，因为他有远大的志向，没有逞匹夫之勇，忍小而谋大，“动心忍性”，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而言，“忍”的意义在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进退荣辱，不为生活小事影响大局，放眼长远和未来。

“犯而不校”。这是《论语》中颜回的话，意思是被人冒犯不去计较。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相处，难免发生矛盾摩擦。当一个人遇到利益被侵犯或者尊严被人冒犯的情况时，要心平气和地协商处理，尽量化干戈为玉帛。忌大动肝火，脾气暴躁；忌锱铢必较，睚眦必报；更忌争强斗狠，冤冤相报。争争的结果是“忿而争斗损其身，忿而争讼损其财”。小矛盾争执处理不慎，有时会酿成大祸，严重的会造成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悲剧。《忍经》引彭令君言：

“一朝之忿可以亡身及亲，锥刀之利可以破家荡业，故忿争不可以不戒。”正如古语所云“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忍”的处世原则不是无原则和无非非观念地妥协退让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忍”也是一种心性涵养的定力，是官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忍经》引《吕氏童蒙训》云：“当官以忍为先：忍之一字，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是先务。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办？”为官者经常会遇到一些棘手难缠之事，猝然而临之，更需要忍字当头。《吕氏童蒙训》亦云：“当官者先以暴怒为戒，事有不平，当详处之，必无不中”，即慎重周详地处理事情。特别是那些面对群众矛盾纠纷的干部，处事应该心平气和，虑事周详，力戒暴躁鲁莽。

“唯得推恕”。“忠恕”既是儒家“爱人若己，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的体现，也是儒家主要的处世原则。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人处世无非两件事，对己和待人，即对内和对外，“忠恕”是对外的原则，对自己不适宜。吴亮引范仲淹次子范纯仁的

（据《学习时报》）